

商品二因素的逻辑意蕴

肖安宝,古月铭

(广西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加上商品交换根据与交换目的的差异,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迥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市场力量(剩余价值规律)、社会力量的合力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运动,出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紧张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党和政府、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合力以使用价值作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美好生活的需要,使得人们的选择得到尊重、人们的活力得以激发,从而推动人们得其能得、得其应得,实现人、人的活动与人活动的结果的一致性,使社会空间丰富、生态系统稳定。以商品二因素关系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异性,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科学理论依据,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使用价值;价值;剩余价值;商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23)02-0032-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作为现代社会“财富形式”的商品。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也正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以及商品交换的根据与交换目的的差异,使得商品世界和市场经济纷繁复杂。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迄今为止发展生产力的最好方式,就在于其内在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而价值规律则是通过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来发挥作用的。因此,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矛盾运动的科学认识是构建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

一、商品二因素:使用价值与价值

商品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作为生活资料来直接满足,或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也就是说,物的属性决定了其有用性,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资本论》中提及为“商品体”“社会财富”或“财物”),而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可有使用价值的不一定是商品,如天然空气、未经开垦的土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就具有使用价值却没有经过劳动;或经过劳动却没有用来交换的产品。

使用价值体现为人与自然之关系。自然与人统一于生态系统中。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植物、动物到进行生命活动的人,它们构成生态系统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生命的链条——“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循环使用

收稿日期:2022-12-25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科学内涵和内在关系研究”(21&ZD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安宝(1970-),江苏东海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源哲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古月铭(1996-),江西赣州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价值链条。自然包括直接或间接提供给人类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生命物质、非生命物质与能量,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以系统方式存在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等。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1]“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进而,通过“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12]成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都是在“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3]的情况下逐步发生的。也就是“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4]。但都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15]。

发现物的这些使用价值的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这些使用价值找到社会尺度,也是历史的事情。这社会尺度也就是价值,人类无差别劳动在使用价值上的凝结。商品价值存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商品体之间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若商品之间是等价交换,反映的是其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否则,则是不平等关系。人类实践表明,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相互“斗争与合作、冲突与互助”,形成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的存在与变化,源于人自身作为一种“与自然物质相对立”^[16]的社会性,包括智力和非智力(情感、意志力、勤劳)等精神要素与非精神要素。这种社会性的扩大与增强“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17]、“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18]等科学技术和各种对人类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所形成的知识(含制度)的日益增进;而潜力被激发,往往是在自己的归属感、被尊重和发展等需求得到满足后。这也就是说,个人的发展程度,受到“背后的社会过程”^[19]即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所制约。

科学认识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内涵,有助于规范对商品世界的认识,而对使用价值与价值矛盾关系的把握,则增强了对商品主导的人类世界的认识。

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上,有价值的商品一定有使用价值。生产商品,为自己生产价值的同时生产的是使用价值,而且是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为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但在泛市场化的世界中,不是劳动产品的也有可能是“商品”。还有,商品不止有一种使用价值,有的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展现出更多的属性。如果把“价值”本身也看作有用属性,也正是除消费者以外的参与者所看重的,但最终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是使用价值而非价值。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与价值统一于商品,却不能为同一主体的矛盾。但使用价值与价值不能为一个主体所拥有,也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不是同一个主体,生产者为消费者生产使用价值,通过商品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中;生产者获得的则是价值。更要指出的是,价值的大小或多少,所含的意蕴是不一样的。还有,个体劳动在多大程度上有价值,也是值得考究的。

人的主体性与自身客体性的对立统一。人的发展取决于自身,人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发展到何种程度,是由其客体主体化程度决定的——劳动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等。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就使客观事物不断主体化,或不断增加交换形式,推动社会形态不断从低级向高级更替,也推动自身走向全面发展。说到底,人类就在资源生成的有限性与人类内在潜力的无限性的矛盾中发展。

物质有用属性的多样性与使用的单一性的矛盾。每一种客观事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但发现这些不同的属性,以及使用方式,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面对同一种资源的多种属性,人们能否同时使用这些属性或优先使用哪个(些)属性,与人们的实践能力与需要程度有关。“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和“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20]。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由此决定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决定了人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商品的丰富性及其差别多样性存在的统一。

使用价值量的积累与增加(变动)和价值量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在特定社会发展阶段,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是相同的,但生产力发展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断增加的。市场之所以能极大地推动社会财富的增长,就在于市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市场力量——价值规律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与竞争机制等杠杆,把根植于市场主体中的一种致富冲动、内在潜能和斗志化为实践活动。而在社会中,生产者不是唯一的,消费者也不是唯一的,使用价值的实现与否存在“惊险的一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阶段——从传统的小商品到纺织、钢铁、造船、汽车、电力等一般传统产业,到电脑、机器人、现代电信、集装箱运输装卸、信息技术等现代产业,再到清洁能源、电子、宇航、海洋、遗传工程等战略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资源种类与数量剧增。交通基础设施也在加速发展,努力缩短“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即“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4],逐渐使人类共处在一个地球村中。

在这一人类历史进程中,新使用价值的生成,不仅是劳动者把物化劳动的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体上,而且也把活劳动物化在新商品体的创造、维护和利用之上,使之满足人们新的需求或重新满足人们的需求^[5]。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增加的使用价值归谁占有和支配、消费,能否物尽其用?一定的价值总量在社会中又是作出怎样的改变?这需要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状况来回答,所有制状况不仅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6],也是“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7]。

区分社会关系与划分经济时期的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8]据此,发展市场经济,是以价值为中心还是以使用价值为中心,取决于生产关系性质与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上层建筑)性质,国家成为使用价值配置的一种工具——一方面用军队、法庭等国家机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建构一套话语系统,即通过意识形态等形式来为其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合法性论证。由此,国家“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使用暴力”^[9],且权力运行的空间与力度远远超过社会中其他组织力量,决定着“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这不仅关乎社会总劳动的配置,也关乎社会劳动的增加速度。

除此,无论人类演化发展到任何程度,作为一个物种的存在,总有维系其存在的一种本能力量——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力量(“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0]),如习惯、传统、威信和道德等,推动使用价值在需要的人之间流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推动社会成员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最终使种族可以延续下去,这种伦理力量以不同的形式一直维护人类的存在。

二、以价值(剩余价值)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运动趋向

价值是商品二因素之一。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与特殊规律,体现的是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品的价值所带来的。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显性存在,并呈现分离趋势加剧,也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就要通过强制的危机显示出来”^[11]。这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

(一)国家权力、市场权力、社会权力之合力:以剩余价值为中心

资本主导下的市场力量、政治力量以及社会伦理力量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价值增殖是资本生产的唯一目的。资本主义阶段,不论是圈地运动和贩奴贸易,还是到东方掠夺财富的航海运动都在其列,后来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国家,都离不开国家政权的力量。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推动资源流动,使得失业或没有充分就业者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资本给雇佣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工资,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12]。

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被极度扩大化,不仅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不断地被商品化,而且,资本把人周围的一切(自然和人自身)——都折算成市场价值(真正满足人们需要的是使用价值),于是出现资源的单一利用(未充分实现其使用价值就被废弃),其属性多样性无法满足人类的多种需要。鉴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特性,这一既得利益集团有可能为了实现对利益更多的占有和维护,无论采取何种措施,追求支配资源权力的社会伦理,也只能使社会成为一个机械的整体。其中,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就演变为劳动力商品与生存资料的“等价”交换。当市场主体之间存在虚假平等时,即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仅具有形式上的平等时,劳动者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得以生存,此时财富增长与社会进步并不同步,也带来资

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矛盾的加剧。

此时,市场交易法则不断向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渗透,占有资源越多就越能在社会关系之中凸显身份与地位的价值体系——“消费物的本身,而是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1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资本基础上形成的利己主义加剧了剩余价值的争夺;而作为人类生存底线的伦理力量化身的社会组织,如各种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慈善组织、协会等非官办、非营利、志愿性、自治性等元素,采取各种行动力图缓解或减轻资本带来的紧张状态。虽然这一力量很弱小,但也能唤醒民众不能置此种状况于不顾——在应对重大社会危机时,往往能转化为推动社会成长发育的持续动力。在此环境下,社会自行产生出诸如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的工人运动组织等,力图减少市场带来的危险,但成效不明显。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利润分配总是偏向掌握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新材料”这一方,即更加聚集在少数发达国家的少数人手中。如发达国家利用他们的技术和成本优势,极力扩大高技术含量与低端产品价格之间“剪刀差”,获取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增长而生成的红利,随着资本逻辑的推进,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通过资产价格上涨和庞氏债务膨胀等方式实现自我循环;抵押贷款证券化或支持证券和债务抵押债券等,致使实业成为资本逐利的牺牲品。这正是博克斯贝格所言,“现在的金融体系及其自由化会使那些已经享有特权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11]。

(二)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关系看市场经济运动趋向

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当资本主义国家助力资本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就会强化使用价值与价值之背离,也就是将剩余价值(货币乃至资本)作为追求的目标时,使用价值就是交换的工具与媒介,使用价值在人和自然之间流动中断。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已经不仅是生产的力量,而且是破坏的力量。

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大量商品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即使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但制度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不仅只会出现“杰文斯资源悖论”,还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隐产品”^[12],从而造成生态恶化——当一些“商品”无法承担更大的“价值”时,就会连同“隐产品”一起被抛弃掉——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液体废物污染、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等影响人们的食物供应和居住环境问题,冰川和冻土消融和海平面上升、破坏生物链、食物链,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等危害生态系统的问题。大自然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周围景观污损不堪,河流被污染,粮食和原料的生产能力遭到破坏。此情况日积月累,导致人和自然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往往将生态环境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攫取其生态资源。换言之,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超过自然之承载力与包容力,或人与自然正常的物质能量互换被割断,使得经济增长的结果只能是“反于道,坏己之境”,出现生态系统失衡,打破生态系统本身的稳定。这表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13]。

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出现了民生即“国民的生计”^[14]问题,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存与发展跟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不匹配,这些社会成员没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使用价值未能在社会成员间充分流动。托马斯·皮凯蒂对西方发达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了分析: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即当初的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年前大8倍;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当今美国1%的少数群体享受着最好的住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最好的生活,而另外99%的多数人的命运被捆绑在一起^[16]。北欧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施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但高税收不仅增加了企业成本和降低竞争力,也使社会效率不高,使得可持续发展受阻。此外,还出现人力资本不足导致公共服务不足、经济增长困境的资源诅咒;或城市化进程中因环境恶化、两极分化甚至社会动荡等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的中等收入陷阱;或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大量贫民窟和环境恶化的拉美陷阱等。

正如卡尔·波拉尼所指出的那样:“若是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类命运和人类的自然环境的唯一指导者,实际上甚至是购买力总量和用途的唯一指导者,那么,社会则会因此而毁灭……剥去人类文化制度的保护性外壳,人类可能会从社会为所欲为的作用中消亡;人类可能会作为剧烈的社会混乱的牺牲品而灭亡,而这种混乱则是由邪恶、颠倒黑白、犯罪和饥饿所引起的。”^[17]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推进生态建设,鉴于资源的资本属性,至今效果并不令民众满意。

通过市场经济“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7]。然而,这一过程也会出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废弃物的积累至生态问题——在努力节约时间的同时又在浪费时间。

三、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运动趋向

要克服资本主导的以追逐剩余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必须回到劳动主导的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让价值成为推动使用价值实现手段,推动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为人们从形式平等进入到实质平等创造条件的轨道上来。换言之,考虑有限的使用价值优先“满足谁的需要,谁有资格获得满足”——一是优先满足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二是优先满足人们共同需要,推动从“剩余价值”向“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转变。

在现实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推动完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优势互补的体制机制,即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换言之,推动党和政府、市场力量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伦理底蕴的有机统一,使剩余价值服务、服从使用价值,从而达到市场经济服务社会主义的目的。

党和政府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抓手,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逐步创造价值规律作用的有利条件,营造市场配置资源的良好环境,不断回答时代所提出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无产阶级的执政党”“怎样实现科学发展”以及“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在现实中找到了建设一个公平世界的方法^[18]。也就是,抓住“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19],紧密跟踪亿万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20],也就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但还能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两个“毫不动摇”;规制资源产权(明晰所有权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占有、处分、收益等权利),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利用资本股份性质、劳动者劳动持股,在逐渐扩大互利共赢的区域共同市场中使社会财富增殖;通过社会信用机制,激励良性竞争——缩短再生产,加快商品流通,减少资金占用,为高效率的生产准备条件;完善法律、健全机制,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为市场主体提供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通过国债、有价证券、股票等市场“最有力的杠杆”的调控方式^[2],使金融虚拟资本服务实体经济;从肯定鼓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措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通过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向社会提供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教育、医疗、科技发展等基本公共品,推动价值服务于使用价值,保障劳动支配资本;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中,从顶层设计“良好的生态是民生的最大福祉”,坚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等体现出以使用价值为中心的理念^[22]。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市场主体之间平等竞争,以便充分地发挥每一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市场激发主体推动资源结构优化,让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转换与空间位移,让资源尽其用尽其才,防止链条的断裂,形成高质量的经济方式。更加彰显人类自身资源(先进的思想、科技与制度),推动财富增长从传统的“以物质资源为本”转向“以人类自身资源为本”。通过合适的手段使得生产与消费后的废弃物再成为资源,使物质链逐步转变为使用价值链,加快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市场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推动客观事物转变为资源,进而将一种资源(废弃物)转化为另一种资源——新生成的资源,如垃圾资源化、废弃物再生化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原材料的节约和推动机器质量的提升和更新换代——不断缩短“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的尺度”^[23]的劳动时间,以及“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24],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社会总劳动的节约,绿色机关、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等生活方式;鼓励使用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等“人道的发展源泉”^[25]。

市场激励提高科技创新活动效率,发展出一种使用少量资源、少排放污染物、能把所有废弃物转换成再生资源的技术或设备,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的相互交织、相互支撑,不断延伸自然资源的宽度、

深度与广度。也就是,科技创新将使市场主体生产出同样多的商品需要越来越少的成本,或同样多的成本会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或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等。简言之,经济增长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高产出转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产出,促进物质和能量在生态系统中沿着食物链流动,形成相互依存的链条关系(即物质链),最终使得资源生成速度超过损耗速度。这不仅是资源纵向的延长,也是资源体量的扩张。

在社会伦理力量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结合,逐渐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强调使用价值的优先地位,摒弃“为生产而生产”的生活方式,培养民众生态意识,也使得市场与公共领域之间形成适度的张力——倡导市场主体的诚信和职业道德、个体与整体之间有序竞争与合作、效益与公平以及利益与道德的辩证统一——为人们提供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调动人们的创新激情和创业精神,弘扬“劳动最光荣”,进而用知识驱动与外溢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和促进个人发展,推动职责权利的统一,推动资源高效利用——确保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达到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耦合。着力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即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推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推动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公有制基础上社会成员间共识的逐步提升,社会伦理的力量也在加强。由此,成为社会共识的伦理力量推动人们围绕自身需要来选择资源,实现自由发展。到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24]。

社会为个人活动空间和个人创造力提供宽松自由和团结活泼的环境,国家为个人发展提供制度公平和激励机制,社会活力和国家强盛离不开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社会伦理以弥补“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把社会上分散在各类团体、家庭和个人的一切现实和潜在的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整合,向“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使得社会主义逐步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双向互动的画面,从而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总之,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是以价值为目的、使用价值为手段,还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价值为手段,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样态是不一样的。这也正是我们审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519;531;540.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3;997.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77;118;208;273;605.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196.
-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8;106-107;135-136;563.
- [6] 肖安宝.资源创造论:新时代的资源哲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17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591.
- [9] (美)诺斯,陈郁.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1.
- [10]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48.b
- [11] (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胡善君,许建东.全球化的十大谎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43.
- [12] 鲁品越.汇率与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兼论“隐产品”价格机制[J].学术月刊,2005(10):111-114.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 [14]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02.
- [15] (法)托马斯·皮凯蒂,巴曙松.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16] (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张子源.不平等的代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 [17] (匈)卡尔·波拉尼,冯钢,刘阳.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72-77.
- [18] 杨雪冬.全球化时代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J].理论导报,2009(04):8-10.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4.
- [20] 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J].求知,2021(12):4-11.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29.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
-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2.
-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4.

[责任编辑:栗红蕾]

[助理编辑:王 瀛]